

热历史

古人发明蚊香之路



全世界的蚊子有三千多种,其中雌蚊子在繁殖时主要以吸人或动物的血为食。被蚊子叮咬后,不光皮肤发痒,甚至会染上疟疾等传染类疾病。

烟熏法是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。蚊子怕烟熏,还惧怕一些特殊的味道。古人发现蚊子的这一习性后,就用烟熏驱蚊。古人发现,燃烧艾草、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,而且烟雾不多,味道也不呛人。于是,艾草、蒿草就成为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,还被制作成最早的驱蚊工具“火绳”。一直到改革开放前,火绳还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被使用。秋天,人们将结过籽的艾草、蒿草采集回家,像编辫子一样将其编成绳状,然后挂在房梁上晾干,避免受潮。等到第二年夏天,火绳就可以派上用场了,晚上睡觉时在屋内将其点燃,驱蚊效果是极好的!火绳的功能类似初级版的蚊香。

到了宋朝,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上制作出了蚊香。宋代《格物粗谈》记载:“端午时,收贮浮萍,阴干,加雄黄,作纸缠香,烧

之,能祛蚊虫。”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,古代“蚊香”里有雄黄的成分。雄黄是硫化砷矿石,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。另外,书中还提到了古人在端午时节采集材料制作蚊香,这很有可能与古代端午采集艾草的习俗有关。

蚊香的制作工艺在清代进一步提高。晚清时,一个来华采集茶种的英国人曾写过一部名为《居住在华人之间》的书,其中就有关于蚊香的记载。这个英国人当时从浙江西部去福建武夷山,途中由于气候炎热潮湿,被蚊子叮得整夜无法合眼。他的随从就购买了一些当地人使用的蚊香,驱杀蚊虫很有效。他把这一信息传回欧洲后,引起了欧洲昆虫学家和化学家的极大兴趣,询问他这种蚊香是由何种物质制成的。后来,他在浙江定海获得了这种蚊香的配方—松香粉、艾蒿粉、烟叶粉、少量的砒霜和硫黄。是的,含有砒霜!不知道古人烧这种蚊香会不会中毒。

(《北京日报》)

·连载·



荀子重法

荀子名况,世人又称孙卿,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。关于荀氏,《竹书纪年》记载:“晋曲沃(武公)灭荀(姬葡封地,在今新绛席村),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,是为荀叔(息)。”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有“荀息”亦称“荀叔”,所以原氏黯即为荀息,被封荀国故地,以地为姓。荀息乃荀子先祖,亦即荀子为绛州古国荀姓的后裔。

荀子一生游历多国,有齐、燕、秦、楚等,曾在齐稷下学宫讲学。在楚国,被任命为兰陵令。楚国春申君死后,荀子失去官职,退而著述,《荀子》为其代表作。尤其是《史记》载荀子“三为祭酒”(学官之长),“最为老师”,得到诸子百家的认可,足见其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地位,可谓集大成者。

荀子为先秦时期的儒学大家,他在参考吸取各家学派观点的基础之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重大发展,重点阐发了孔子关于“礼”的理论,特别强调“礼”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。其学出自子夏之学。三晋儒学从子夏开始,到荀子时代趋于成熟。他提倡的“化性起伪”的教育观,“隆礼重法”的礼乐观,“学不可以已”的学习观,“以义制利”的道德观,“知之不若行之”的实践观等,皆成为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。

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,认为人性本恶,性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。因为人性是恶的,所以要用礼治来约束,做到“明分使群”,各人都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,各尽职责,共同构筑良好的社会秩序。

荀子的教育思想贯穿实践之道,强调人只有通过实践之行,方能达到“明”的境界,方为圣人,并主张实践是检验是非善恶的标准。

荀子的法治思想是把法视为礼的延伸与细化,礼是法的基础,是仁义道德的沉淀,而法是礼的书面与刚性呈现。两者有机统一,法治须以礼制为基础。

荀子的“隆礼重法”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。荀子的两个著名学生李斯与韩非都发展了荀子法治的思想,故成了法家的代表性人物。

虞坂盐道

据《水经注》记载,虞城西北二十里许有长坂,谓之虞坂,在车辘峪、二郎山东北。坂为山间的坡道,周武王封虞仲于古虞旧墟,因而称虞国,其坂谓之“虞坂”。虞坂古盐道开凿于西周初年,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,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人工开凿道路,是河东池盐运销周、郑等地的主要通道。

虞坂盐道现存路面全长约7.5千米,宽2米~4米,原来道路大部分已不存在,仅锁阳关附近数千米还保留原状,石坂路有马槽槽、车辙槽痕迹等。该道从盐湖区磨河村东起,穿过薄山,越过中条山,经胶泥洞、瓦罐庙、锁阳关、颠岭(今称鞍桥)等,经虞城到达平陆境内的茅津渡。

青石槽是虞坂古盐道最陡峭路



段的俗称,开凿于坚硬的岩石体,路面狭窄,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大山,青石上道道凿痕十分清晰。锁阳关是古盐道青石槽最窄处,古代在此设卡管理。春秋时期,锁阳关是虞国边界线。公元前655年,晋献公通过此虞坂道灭了虢国,回军途中又灭了虞国,冀国,留下了“假虞伐虢”“唇亡齿寒”“辅车相依”“屈产之乘”“垂棘之璧”等成语。明代重建“古锁阳关”,两侧楹联:“矗矗树屏藩南顶天柱,婷婷罗保障北护虞州”。北口右下原立一通“虞晋分野,平安通衢”石碑,署“大明洪武四年六月河东卫戍使重建”。

相传“伯乐相马”的故事发生于此。据《战国策》记载,春秋时期秦国郃地人伯乐,本名孙阳,少有大志,擅长相马。他看到一匹马负盐车“蹄申膝折,尾溲淋漓,漉汗洒地,白汗交流,中阪迁延,负辕不能上”,于是下车抚马痛哭,并脱下自己的麻衣给马披上。千里马似乎遇到知己,于是昂头嘶鸣,声音直上云天,响亮如金石之声。伯乐相马故事说明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。

虞坂古道为古代河东跨越中条山通往中原的主要运盐通道,但时有坍塌壅塞。北周时期还另开修一盐道,即车辘峪或车辘道,从山下牛家院开始,民间遂有“打开牛家院,能发九州十八县”的传说。取道车辘峪是穿越中条山的捷径,到达山顶后,既可通向茅津渡,也可通向大阳渡。元代再度开修了这条盐道。

《平陆县志》(乾隆版)载:“横岭在县治大阳渡北二里,西北四十五里中条山之脊,西通解州,东达夏县,北至运司路,名车辘峪。”

车辘盐道是一条只有驮马能通行的崎岖山路,河东池盐由此源源不绝输送至黄河渡口。茅津渡淤塞,则至大阳渡,大阳渡淤塞,则达茅津渡,保障了河东池盐运往中原,是古代中条山地区重要交通线。沿途有北周大象二年、元代和清代嘉庆十七年的摩崖石刻等文化遗迹,也是河东池盐穿越中条山的五条古盐道中最繁忙、最长久的重要通道。(29)



▲虞坂古盐道

史海钩沉

警枕励学 指痕留香

枕头,家居之物,极为常见,睡觉休息用。而在北宋名臣司马光看来,枕头还有另外一个功能,那就是提醒他:喂!已经睡得差不多了!快起来读书,学习!要达到这个目的,司马光的枕头当然与现代人用的枕头有很大不同。他的枕头是用一段圆木做成的,名为“警枕”。试想一下,这个圆滚滚的枕头,靠上去应该是不怎么舒服的,所以只有疲惫到了极点才能勉强入睡。睡了一会儿,翻身之时,又会因为那圆滚滚的外形,让头、颈落下来,从而醒来。

司马光用这种方法来逼迫自己苦学,可谓对自己很狠。而这种习惯,那是家风使然。他在步入仕途之后,不追求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,始终致力于治国理政与研究学问。他的俸禄收入并不少,朝廷还提供了多达一百多亩的所谓职田来当福利。但他一直是布衣粗食,钱财多拿来周济穷人,生平所好就是读书,藏书,在这方面,他可算得上天下首富,手握藏书数千册。

最能体现司马光好学之心的,则是一个



▲夏县白沙河生态公园展出的“圆木警枕”青铜雕塑

细节——读书之法。这里所谓的读书之法,指的是如何拿书翻书。司马光读书时,首先身体坐得极为端正,然后用右手拇指轻轻地托起书,再用左手食指轻轻揭开每一页。他的要求是读过之后,书本不能出现任何折皱印痕。(《北京青年报》)

生活史

凿井而居 因井成市

打井汲泉,一直是中华民族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重要途径。早在原始社会,勤劳聪慧的中国先民发明和创造了水井水利工程。

井的本义为水井,其引申义为乡里和人口聚居地。井在古代人心目中是不可改动迁移的,正如《周易》所说“改邑不改井”,只有这样才能“无丧无得,往来井井”。

水井的发明与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。远古的人类只能在靠近江、河、湖、泊等有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,依水而居的现状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导致对水的低度需求,使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对水井的发现视而不见。由于人口的相对增长,或是居住地河水偶然的干涸,才迫使人们把这一发现应用于凿井取水的实践。

发明凿井后,人们便摆脱了对江河湖泊的依赖,扩散到所有有地下水源的广阔领域,从而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自由,开启了人类从逐水草而居到村落定居的历史,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。



▲永济市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陶井本栏图片 记者 刘亚 摄

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成千上万处古井遗迹、遗存。诸城凉台东汉画像石墓、嘉祥东汉画像石墓均有水井的画面。其中,诸城水井井台为四方形,栏为井字形,栏上立两柱搭架,水井图像栩栩如生。水井的发明扩大了人类活动范围,促进了社会的形成与发展,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。

而“市井”作为中国文化的构成部分,在城乡大地也有诸多实践。从字面意义上看,市和井有很大的关系。《管子·小匡》:“处商必就市井”“立市必四方,若造井之制。”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市,买卖之所也。”据此,古人把商品买卖的地方叫“市井”。

早在先秦时期,水井与市井便碰撞出火花。水井周围因为公众汲水就成了公共生活空间,并逐渐形成在水井边进行买卖活动的场所,水井自然地成为市井的发源地。市井是比水井高一级、商品交易较为发达的贸易之地,又指平民的住宅区,城市是市井的发展方向。(《大众日报》)